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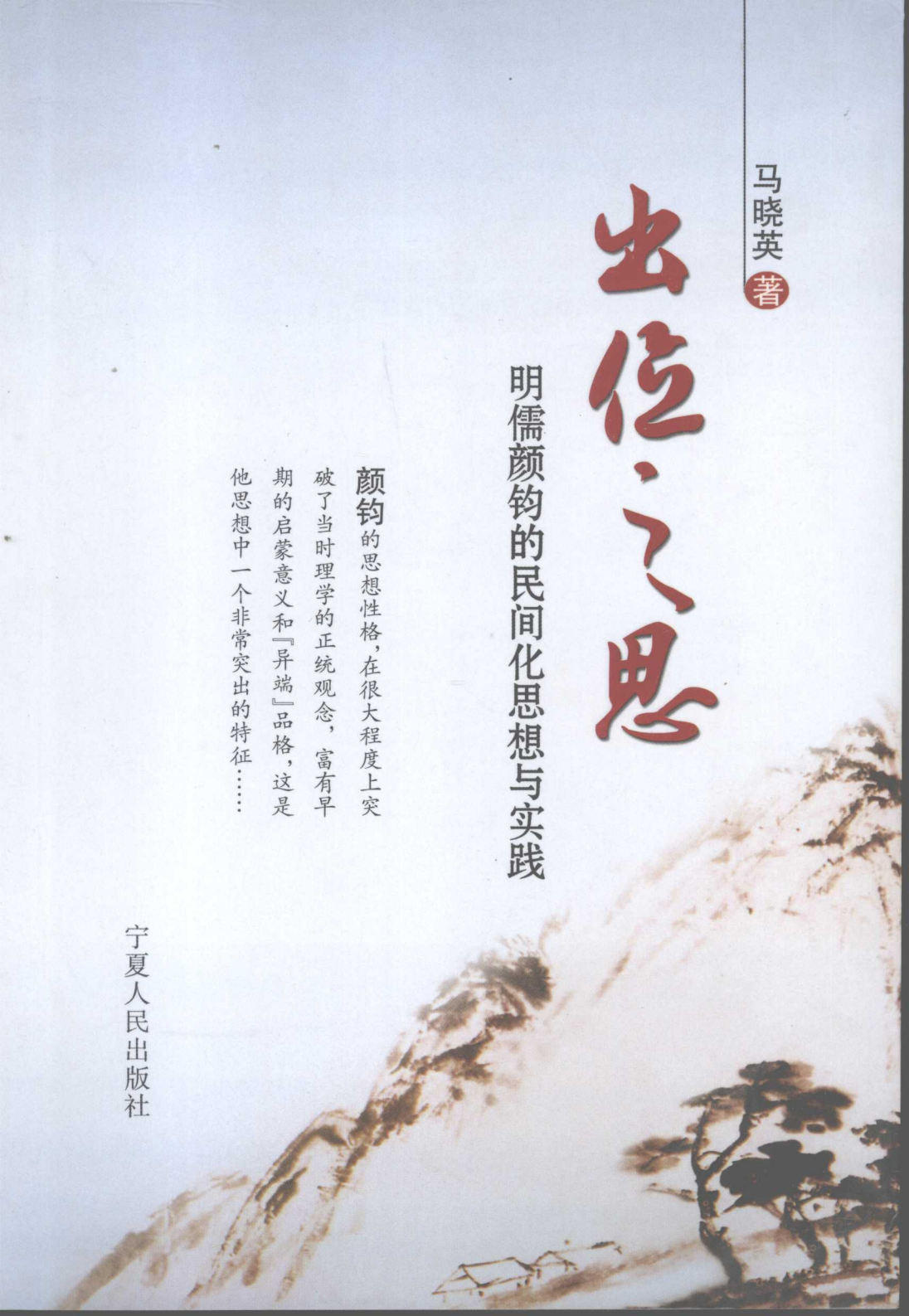
马晓英 著

出位之思

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

颜钧的思想性格，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理学的正统观念，富有早期的启蒙意义和『异端』品格，这是他思想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位之思

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

◎ 马晓英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位之思: 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 / 马晓英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27-03625-8

I. 出... II. 马... III. 颜钧 (1504~1596) — 哲学思想—
研究 IV. B 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780 号

出位之思: 明儒颜钧的民间化思想与实践

马晓英 著

特邀编辑 何志明

责任编辑 马若飞 康景堂

装帧设计 杨祎霞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501435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版设计 宁夏联美达印艺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0 千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625-8/B·11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内容提要

颜钧是晚明泰州学派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对早期儒家经典和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平民化解释,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大中哲学思想体系;又通过周游天下的讲学活动,使儒学进一步走向民间和通俗化。他的思想性格中,既有张大自然利欲和主体意识、突破理学正统的一面;又有回归孔孟、维护儒家基本价值理念的一面;同时,还存在着神秘主义、反智主义的倾向。在他的社会活动中,既有和俗乡间的伦理实践,又有反叛现实社会秩序的“异端”之举。

颜钧的平民化理论探求主要表现为:他对儒学经典《大学》和《中庸》进行了全新解释;还以二书所涉心性、修养工夫等问题为核心,提炼出一套以仁、神为特征的思想,以此建立了他的“大中哲学”体系。大中哲学的提出,奠定了颜钧在泰州学派乃至整个晚明思想史中的地位,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理学家。这种创新体现为:在心性论中,提出“仁为心之本体”说,较王阳明的“良知本体”和王艮的“乐本体”更具有丰富的人性内涵;还提出“心之所欲即是性”,说明心性合一之旨;在修养工夫上,提倡“放心体仁”,顺任心性自然。同时从实践操作的层面提出了“七日闭关”这样一种具有佛、道教修养特点的静坐体验方法;在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的追求中,提出以保身造命为基础、以天下归仁为内容的“大成仁道”说,并指出大成仁道是一种易简可致的

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

颜钧思想在展开过程中表现出自然主义、反智主义、平民主义以及狂侠风格等特征。对于原儒精神的继承与对理学正统的背离,构成了他之思想精神的内在紧张。这一矛盾同样彰示了泰州学派在进一步展开中面临的尴尬境遇:如何在民间儒学与精英儒学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张力,以促进儒学的真正发展,这不仅是颜钧乃至晚明王学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难题,也是现代儒学乃至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之一。

序

牟钟鉴

凡关心明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王阳明后学有一支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中有一位重要学者叫颜钧（山农）。颜钧上承徐樾、王艮，下启何心隐、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中枢人物。他狂放不羁，语出常惊世骇俗，“每言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第过而不留，勿成固我而已”。因此他被当时正统派目为“异端”，后来又被五四运动以来的学者视为反叛旧传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

颜钧真的是一位不讲道德只讲情欲的思想家吗？他的思想的来龙去脉是如何的？里面有没有复杂多样的成分？他与孔孟、程朱、陆王分别是怎样的关系？他的历史地位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楚的。由于颜钧遗文湮没不传，多年来人们谈论颜钧，主要依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提供的有限资料，无法全面深入把握颜钧的思想。十多年前，族刻本《颜山农先生遗集》被发现，接着由黄宣民先生校订整理的《颜钧集》正式出版。颜钧研究开始步入坦途，专题论文日渐增多，而异见争论随之纷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好现象，但未见有研究专著问世。

马晓英在我这里攻读博士时，对颜钧发生浓厚兴趣，我也鼓励她从事颜钧研究。我早年受容肇祖先生及其《明代思想史》的

影响,一度对明代思想与哲学比较关注,认为它是一座生命智慧的富矿,而开发不够,因此曾打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着手进行,一直引为憾事。现在由自己的学生来作明代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这使我感到宽慰。考虑到已有的资料和成果比较丰富,而马晓英又有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我相信会形成一部有份量的专著。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马晓英在广泛收集颜钧资料和综合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经过数年努力,顺利完成颜钧研究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得到专家们的好评。又用了数年时间修改补充,遂形成这部书稿。它的任务就是对颜钧及其思想进行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阐述,帮助人们获得对颜钧的更为完整和深入的认识,并通过颜钧研究拓展泰州学派的研究,进而推动明代思想史的研究。

这部书考察了颜钧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颜钧生平;构建了表述颜钧“大中哲学”的理论框架,包括它的经典依据、它的心性论和工夫论、它的人生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阐释了颜钧思想的特征及其在当时和对后世的影响。全书视野广阔、内容丰富、脉络清晰、推证周密、持论平实,在许多问题上对传统观点有所突破,它使颜钧的形象更接近于真实,确是一部青年学者的用心之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

有几点值得特别加以说明。

第一,作者论述了颜钧思想的内在紧张,即对原儒精神的继承和对理学正统的背离,这是以往人们所忽略的。在人性论上,理学家忽视民利与个人,把“天理”无限抬高,与“人欲”对立起来。颜钧起而纠正之,强调自然人性之正当合理,而不免有过激之言,就其思想主流来说是回归孔孟的义利统一、群己相依的传统,并不是什么王学之流弊,更不像王世贞指责的“鱼馁肉烂,不

可复支”。理学家偏离了孔孟，颜钧又偏离了理学，却没有背叛孔孟的真精神。黄宗羲所说的颜山农、何心隐“复非名教所能羁络”中的名教，其实是指当时被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理学，压抑人性，禁锢心灵，是需要冲破的。而颜钧是一位忠诚的儒者，他要继承儒家仁诚之道来创造性地发展儒学，兼顾了人性中道德理性与自然情欲两大要素，使之更好地面向民生，面向市民社会，这是理论上的进步。

第二，作者指出颜钧的“大中哲学”是一种新仁学，这很重要。孔孟儒学的核心和精华是仁学，以爱人为宗旨，以忠恕之道为原理，以和而不同为规则，所以仁学是情感和理性的结合。宋明新儒学有三家：理学（以理为本体）、心学（以心为本体）、气学（以气为本体），三家在综合儒、佛、道三教基础上对于儒学皆有所创发，形成儒学理论的高峰，自有其历史地位。他们从生意上说仁，使孔孟的仁学增强了对生命的关注。但他们都未能直接继承孔孟的仁学，未能在“仁”的理念基础上讲“理”、讲“心”、讲“气”，所以才出现忽略或扭曲生命活泼发育的种种流弊。特别是政治化的理学，抛开人情说天理，使天理变成了冷冰冰的东西，甚至导致了“以理杀人”。心学家已经在另辟蹊径，讲述活泼有情的“一体之仁”，而泰州学派更是回归人性之常，充分肯定平民百姓生理和心理的正当要求。颜钧之学，以仁为体、心性合一，提出“制欲非体仁”之说，称之为大成仁道、仁神正学，他把儒家的“仁”重新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情实感，并使之健康化，恰可以弥补理学、气学之不足，不仅超越了理学、气学，也发展了心学，下启近代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新仁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儒学要向前发展，离不开孔子仁学的基础，返仁学之本才能开新，否则就会走偏。

第三,作者着力于突显颜钩的平民意识和实践品格,从而也开掘了颜钩儒学与泰州学派的现代价值,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学者们早已指出,泰州学派的重要特征是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在民间普及儒学、践行圣道的济世精神,而颜钩是儒学民间化的有力倡导者、推动者。本书作者不仅从多方面论述了颜钩平民意识的表现,还联系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说明颜钩吸收佛教、道教的神秘主义、救世热情和传道方式,为在民间推行道德文明建设作出了实际贡献。明代民间书院讲会多达1200所,而其讲学活动多赖王学学者,其中泰州学派人士,与有力焉。我们今日要继承发扬儒学精华,同样面临着如何以义引利,把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把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的挑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泰州学派与颜钩的经验,从中吸取智慧。

书中当然还有许多未充分展开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例如,平民儒学是否一定要与士林儒学发生对抗而没有前途?颜钩思想的狂放性格与礼法之教的冲突是真正的对立还是可以统一?书中说颜钩思想有自然主义、平民主义、狂侠风格的特征,这易于被人接受,而说他“反智主义”(采余英时说)和“唯意志论”,则不免引起争议,似乎不能这样套用,这里又涉及对“造命”说如何阐明的问题。还有,作者称颜钩哲学为“大中哲学”(采黄宣民说),似乎不如称之为“仁神之学”或“大成仁学”更符合颜钩本意,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明代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思想家辈出,而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我希望马晓英博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颜钩研究、泰州学派研究和明代哲学史研究上不断有新的创获。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牟钟鉴
-----------	-----

导 言	1
-----------	---

第一章 市民文化与心学涌动

——颜钧思想的时空背景及其学术渊源	17
-------------------------	----

第一节 变化中的晚明社会	17
--------------------	----

第二节 心学的演化与泰州学派的创传	23
-------------------------	----

第三节 阳明心学与江西社会	37
---------------------	----

第四节 颜钧的心学启蒙和访学经历	45
------------------------	----

1

第二章 晰辨学庸 仁神正学

——颜钧大中哲学的建立	56
-------------------	----

第一节 《大学》《中庸》在宋明理学中的意义 ...	56
---------------------------	----

第二节 颜钧大中哲学体系的建立	62
-----------------------	----

第三节 《周易》与大中哲学	67
---------------------	----

第三章 仁为心体与心性合一

——颜钧的心性论	75
----------------	----

第一节 心体内涵及其特征	75
--------------------	----

第二节 精神与莫能	95
-----------------	----

第三节 心与性、命、情	105
-------------------	-----

目录

第四章 放心体仁与七日闭关

——颜钧的修养工夫论 117

第一节 从心所欲不逾矩 117

第二节 静坐体悟与七日闭关 136

第五章 大成仁道 造命运世

——颜钧的人生价值与社会改造实践 156

第一节 保身造命的人生价值 157

第二节 天下归仁的理想与安身运世
的社会实践 164

第六章 颜钧思想的特征及其时代影响 181

第一节 颜钧思想的基本特征 182

第二节 颜钧与泰州学派 204

结 语 颜钧思想的评价及其现代意义

..... 225

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39

导 言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和变革期。从儒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王阳明的心学在成功地取代程朱道学并完成理学内部由“理”本体向“心”本体的逻辑转换之后,自身也开始分化并走向衰落,最终被经世实学思潮所淹没,从而开启了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汉学的先河。造成这种剧变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和势力隆盛且富有平民精神的泰州学派的流播分不开的。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强调“良知”当下现成,工夫即是本体,主张顺任自然,躬行实践。它直截简易的体悟方法和践履方式使王学(按:王阳明心学的简称)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王学中所蕴涵的个体意识进一步张大为肯定欲利的个性解放的思潮,展现出强烈的平民化色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当时市民社会的普遍要求,为一直掌握在士大夫精英阶层手中的王学乃至整个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可能的新路向——民间化路向。但是泰州后人思想中存在并愈发明显的狂狷倾向,却使得它在民间化道路上前进的同时,与官方意识形态(程朱道学)发生严重扞格,甚至距离王学正统也愈来愈远,呈现出某种“异端化”的品格。这就使得泰州学派一方面丧失了官僚上层的肯定,另一方面也丧失了来自知识精英阶层的理论支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抵触,从而最终妨碍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步入衰途。不唯如此,作为阳明后学中最具民间影响力的学派,泰州学派的衰落也预示了王学最终的命运。

在王艮(字心斋)以后的泰州学人中,以颜钧、何心隐等为首的一派产生了很大影响。颜钧上承心斋之脉,下启(何)心隐、

(罗)近溪之学,是贯通泰州学术发展的重要逻辑环节。颜钧通过他的讲学活动,使心学进一步走向民间和通俗化,为更多底层平民所了解和接受,但也使泰州后学日渐偏离王艮乃至心学正统的思想,走上“狂侠”和“异端”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颜钧成为泰州学派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颜钧,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因避万历帝讳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乡中陂村人。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颜钧家庭世代业儒,耕读传家。父兄共6人。其父颜应时曾任江苏常熟训导,教授儒学生员;仲兄颜钊中嘉靖甲午举人,在山东和湖北做过几任小官;其他都是布衣儒者。

颜钧自幼心性愚蒙,12岁才入学宫,随父亲在常熟读书,据说“穷年不通一窍”。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他25岁时,他的兄长颜钊以王阳明的《传习录》教示颜钧。颜钧受其中“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孵卵”四句话启发,闭关静修七日,突获顿悟。其后他就就在家族成员的基础上组织“三都萃和会”,化俗民间,宣讲儒家的伦理教义。此后他辞家出游,访学吉安府境内王门弟子。又北上师从徐樾,并赴泰州王艮处受传“大成学”。嘉靖十九年,颜钧从泰州回江西,开始讲学活动。他在豫章同仁祠宣讲“六急六救”之说,罗汝芳就在这次讲会中拜入颜门,成为颜钧最有名的弟子之一。王艮去世后,颜钧自江西返回泰州,聚会心斋祠,聚友千余,晰辨《大学》《中庸》。此后他一直辗转京师及江苏各地,广泛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嘉靖四十五年,颜钧在南直隶太平府讲学时被捕,出狱后发戍广西。穆宗隆庆五年(1571)放戍归永新家乡。此后直至去世,颜钧一直在家乡讲学、著述,致力于传播心学和儒学化俗的实践。

在泰州学派乃至晚明心学发展过程中，颜钧以其独特的大中哲学思想和任侠狂诞的性格作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成为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赞扬者有之，而毁誉者更是不乏其人。大体说来，在当时以及清代，对于颜钧思想性格的认识及对他的评价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站在维护名教正统的立场上，持批评态度。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评价，往往与对泰州学派的批评联系在一起。比如顾炎武批评以颜钧为代表的一派泰州学人是“小人之无忌惮”；清人黄淳耀说，王学至泰州学派后，“一变而为任侠颜山农、何心隐之流，种种迂怪，世或指为大盗，而流弊极矣。”^①然而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王世贞所言，他将颜钧与当时的侠盗并论，说心学到王艮那里“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②。从理学家的批评来看，引起他们反感和攻击的，其实并非颜钧的思想本身，而主要是他的性格和行为，在他们看来越出了名教的藩篱。甚至到了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仍然认为，有清一代学者对于王学的否定和反动，完全是由泰州学派尤其是颜、何一系对于名教的突破和决裂所引起的。^③

①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二〇《陶菴自监录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别集类二六，中华书局，1965年。

② 何心隐：《嘉隆江湖大侠》，载《何心隐集》附录，容肇祖整理，中华书局，1960年，第143页。

③ 章太炎认为：“心斋解‘在止于至善’，谓身名俱泰，乃为至善；杀身成仁，便非至善。其语有似老子。而弟子颜山农‘钧’、何心隐辈，猖狂无度，自取戮辱之祸，乃与师说相反。清人反对王学，即以此故。颜山农颇似游侠，后来见，必先享以三拳，能受，乃可为弟子。心隐本名梁汝元，从山农时，亦曾受三拳，而终不服，知山农狎妓，乃伺门外，山农出，以三拳报之。此诚非名教所能羁络矣。山农笃老而下狱遣戍，心隐卒为张江陵所杀，盖王学末流至颜何辈而使人怖畏矣。”（《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6~187页）

另一种则恰恰与此相反,持完全肯定甚至赞许的态度。比如泰州学派另一位著名学者罗汝芳就对颜钧的思想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其学其教“能晰孔孟心旨,发先儒之所未发。”^①对其为人与道德,更是衷心钦服:“芳自幼受业其门,承其教育造就之恩,与生身无异,相待密切余三十年,见其家居孝友之笃,与人为善之公,贯金石不渝,质鬼神无疑;其轻财尚义,视人犹己,鬻衣装以给生徒之费,忍饥寒以周骨肉之贫,求之古人,亦难多得。”^②甚至以圣人目之。他在助颜钧完赃出狱时曾说:“芳来赖天,侍师脱险,却自庆为我朝全生两圣人矣。”^③晚明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则标许颜钧等人是英雄,认为正是这种英雄气使得他们不能为当道所容。他说:“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盖英雄之士不可以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④吴焕文认为,在王艮的讲学朋友和门人弟子中,真正继承了王艮思想和精神的是颜钧,“揆而详之,吴公(指御史吴悌)荐章,赵公(赵贞吉)之墓志,总不若夫子之继承躬行也。”^⑤然而我们也知道,罗汝芳是颜钧高第弟子,李贽是泰州学派的旗手,而吴焕文是颜钧在豫章同仁祠讲学时的学生,所以其思想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对他作出肯定评价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① 颜钧:《著回何敢死事》附录《揭词》,载《颜钧集》卷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② 这话是颜钧在《著回何感死事》中所引罗汝芳之语(见《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3页)。这一点也可以通过顾宪成在《小心斋札记》中所谓“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388页)的话得到证实。

③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载《焚书 续焚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80页。

④ 颜钧:《纪游》,载《颜钧集》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第三种则是中间的、相对客观而且公正的评价,其最典型的当属黄宗羲的看法。他一方面批评颜钧的思想言行超出了名教礼法的约束,对社会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另一方面又指出,像王世贞等仅仅依据传闻和山农在狱中的供词,就对颜钧一派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所依据的论据并不可信,而其所作评价也不足取。“今之言诸公者,大概本弇州之《国朝丛记》,弇州盖因当时爱书节略之,岂可为信?”^①因此,他能抛开当时成见,为颜钧立传,在并未见到颜钧文集的情况下,对之作一冷静而客观的评价,甚且就其为人给予积极肯定,这个态度本身也是很公允的。时人张维枢在《静观轩琐言》中也对王世贞的看法及其资料依据进行了驳证。^②

①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703页。

② 张维枢说:“至颜山农、何心隐以讲学中法,心隐至杀身,王弇州推与邵樗朽并列江湖大侠,似为不伦。夫太(泰)州王心斋,固阳明先生之徒也,心斋之后为颜山农,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何心隐,此其衣钵颇有承受处。弇州谓山农与赵文肃(赵大洲)为患难交,以计取其财不遂而弃取之;尝以罗近溪为门人,强使勿廷对,至南京挟诈人财事发,被捕笞坐戍,近溪为营救,纳贿始脱。又谓心隐师事山农,例受三拳而后拜,及密伺山农淫村妇,扼之,亦殴三拳使拜,削弟子籍,因纵游江湖,以计挟吴兴富室数百金……此果足尽二布衣平生乎?文肃、近溪何等气魄识力,山农果污丑,文肃安肯行为患难交?近溪如贪一廷对,岂山农所能笞而强,至生死不相负,营脱之狱免祸乃已?此不惟近溪师友谊重,山农亦何以得此于近溪,则道学渊源,素必有中心悦而诚服之。至心隐家世财饶,弃家学道,危言危行,独往独来,特以聚徒讲学吉安,为江陵所怨,且平日有‘得志必杀我’之语传播四方,及揭榜遇害,列心隐罪状,众观者咸指其诬,由祁门而江西而湖广,无不嘘呼代冤……弇州史笔多出私心,山农、心隐之传据其爱书而为之。至如吾邑吕相得其润笔千金,不难得其竭力回护,此亦已矣。”(文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四八〇,转引自陈寒鸣《〈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载《中州学刊》,1997年3月)

由此可见,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辩护者,其所据以评论的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站在名教的角度,围绕其思想言行是否违反、突破了名教藩篱这一点来考虑的。事实上,不只是宗法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如此,就是现代的研究者们,其对颜钧思想的解释和评价,也往往会归结到名教与启蒙、正统与异端等角度来进行。

本论文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评价背景下来考察颜钧思想的。通过对大中哲学的展开和辨析,我们认为:颜钧的思想性格,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理学的正统观念,富有早期的启蒙意义和“异端”品格,这是他思想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与名教伦理尤其是孔孟思想精神相一致的地方。他的社会实践表明,他是在遵守儒学基本价值规范、极力恢复并积极维护孔学精神的前提下,力图对儒学作一符合平民要求的简化和变革。名教与自然这两种倾向在他身上是同时并存的,是一体的两面,这构成了他之思想性格的内在矛盾性,也是他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本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颜钧思想的时空背景及其学术渊源。由于本书主要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展开讨论的,对于和思想关系较为密切的时代社会文化状况、特定空间中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被研究对象的求学经历、学术传承和流向等,都十分关注,并以之作为思想考察的一部分。因而本章重点讨论了颜钧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空间地域文化背景,以及师承渊源,对于颜钧何以走上心学道路、成为泰州学派著名传人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第二章,颜钧大中哲学的建立。颜钧思想虽然缺乏思辨性和系统性,但却是有特色,有创新。这个特色就在于,他对《大学》《中庸》《周易》的作者和宗旨都提出了新的解释,以之为孔子精